



# 人口生态重建

穆光宗 著

二孩时代

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

茅于軾

作序推荐

“穆光宗教授本着学术良心秉公直言，在中国做一个人口学者责任重大！”

知名人口学者

邬沧萍 陈剑 陈友华 黄文政 易富贤 何亚福

联袂推荐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人口生态  
重建

二孩时代

穆光宗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北 京 •

## 图书出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人口生态重建 / 穆光宗著. —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1

(二孩时代)

ISBN 978-7-5046-7033-5

I. ①人… II. ①穆… III. ①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C9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7351 号

策划编辑 秦德继 辛 兵

责任编辑 王卫英 鞠 强 孔祥宇

特邀编辑 金光印

装帧设计 朱 颖

内文制作 中文天地

责任印制 马宇晨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http: //www.cspbook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010-62103130 传真: 010-62179148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200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46-7033-5 / C · 160

定价: 39.00 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 序一 生育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自由生育

茅于軾

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人口问题关系重大。人一方面是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是消费的主体。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紧密。人又会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地球正在被人类的活动搞得面目全非。人又是家庭的基础，是一个人幸福的来源。正因为人口问题牵涉到的面非常广泛所以全世界研究人口的学者非常众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人口问题。但是在中国研究人口问题和在别的国家很不同。因为中国政府管着百姓的生育，妇女可以生小孩，或者不可以生，是由政府说了算的。所以在中国做一个人口学家，影响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决策，实在是责任重大。本书作者穆光宗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对人口问题的观察具有广泛的影响。他能够本着学术良心秉公直言，也是我愿意为这本书作序的原因。本书《人口生态重建》正是对刚刚公布的全面开放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的一个研究和评论。

中国在三十多年前开始了全球最严格的每个家庭只许生一个小孩的政策。尽管政策过于严厉，缺乏人道，但是我认为在当时大方向还是对的。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换了面貌，从全球人均 GDP 垫底的国家上升到中等偏高。人们由于收入提高，教育普及，对外信息交流，关于人权、家庭、生育等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三十多年前。再固守着老的过

时的政策显然极不适应。现在政府终于认识到生育政策需要改变，全面开放允许生二胎，虽然为时已晚但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进步。

作者指出，过时的生育政策已经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小学生的绝对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同期中人口却增加了40%多。先是小学校招不着生，不得不大量并校。接着中学也发生招生困难。现在大学也在抢生源。从前起劳动力年龄段的人数开始减少。中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面临未富先老的严重问题。作者对养老问题有更宽阔的视野，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所以他提出“有备而老”的新观点。如何在钱有限的条件下对养老有所准备，将是我国未来几十年的重大人口政策问题。

由于中国传统重男轻女，在限制生育的条件下，生育选择男性，使得出生时的性别比严重失调。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里将有三四千万成年男性终身找不着老婆。这样一个社会如何安定得了？作者对这个难题给予极大的关注。

作者还提出“失独家庭”的问题。所谓失独是指独生子女未达生育年龄就早亡，使得一个家庭没有了后代。由于中国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如果不幸早亡，必定造成失独家庭。比如天津新港火灾导致数十名消防员牺牲。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独生子女，这就造成数十个家庭成为失独家庭。一个人不论在世时有多大的成就，如果没有后代，不能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永远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面对中国超低的妇女生育率，弥补的办法光是开放二胎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作者在他的书中提出应该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环顾世界各国，面对超低的生育率无例外地都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多半在经济上给予奖励。我国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超生不但不奖励还要罚巨款。对公务员不但罚款还要开除公职。我国权势最高的七个政治局常委都不敢生第二个孩子。在中国不敢生二胎的另一个原因是小孩的养育费用太高。在北京极普通的

托儿费每月要花三千元，和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工资相当，这么高的托儿费怎么生得起二胎。我国有基础教育的免费政策，应该考虑将基础教育扩大到学前教育。

如果妇女的生育意愿和政府的政策相悖，她和她的孩子将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先是到处躲藏，生活变得流离失所。其次孩子报不上户口，变成黑人。长大一点要上学时，因没有户口而不能上学。再大一点买什么票都要有身份证。因此不能坐火车汽车或飞机，不能办护照，不能买房买车，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一个非人民。这种荒唐的事在别的国家里无法想象。

作者对生育作为基本人权有更深刻的考虑。他说“平等赋权非独家庭生育权意义重大，这是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人口优化、民族复兴的需要。权利贫困是经济贫困和文明落后的根源”。最后这句话说得也太精准了。权利的贫困是经济贫困和文明落后的根源。中国改革成功主要的原因就是公民权利的扩大，或者说是自由妨碍的减少。农民可以流动进城自谋职业，人和人可以自由做买卖，物的使用不再受计划的支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整个社会活起来了。我们今天还要强调改革开放，是指自由还不够，在我国自由还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资源。特别在生育方面仅仅开放二胎这点自由是远远不够的。

恢复人的生育权，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决定是生或不生，实现自由生育，还有一个重大障碍，即全国计生干部将面临失业的问题。全国有几十万名专管计划生育的干部，他们管计生几十年了，做别的事不大会。一旦生育自由化了，他们将无所事事。如果事先不周到考虑他们的再就业，自由生育肯定会遭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计生干部的强烈抵制。一个顺理成章的转变就是让他们管鼓励生育和优生优育。这是在人口学之外必须注意的一个政策问题。

## 序二 以人为本的生育政策的求索

左学金

著名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我国生育政策演变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为实现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迈出了重要步伐。

长期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是学界和公众关注与辩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从马尔萨斯、马克思、库兹涅茨到我国的马寅初等，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这种辩论在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与我国的生育政策实践直接相关，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近年来，尽快放宽生育控制政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正在成为我国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两会代表、专家学者和广大公众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一方面与我国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有关。近20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人口负增长指日可待，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深远影响日益突显，这些情况自然引起了大家对人口问题与人口政策的再思考。另一方面，这种广泛共识的形成，也是我国部分学者长期锲而不舍地研究与努力的成果。穆光宗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中青年学者。

穆光宗教授早在20多年前就开展了对我国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1992年，当我国人口生育率初次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时，穆

穆光宗就开始投身于低生育问题的开拓性研究中，与其他青年学者发起组织了“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此后在学术研讨会的讨论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他的相关理论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例如，他《有关“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人口学刊》1994年第2期）一文提出了生育率三次转变的观点；《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大纲》（《学术季刊》1994年第3期）提出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需要从强制力主导型向自发力和诱导力主导型转变，并概括了生育率下降的人口学与经济社会后果；《生育率下降是有代价的》（《人口与计划生育》1995年第1期）则提出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有代价的这一具有反思意义的命题。

除了理论研究以外，穆光宗教授还重视理论联系实践和对各地生育政策的实践的调查研究。他在对甘肃酒泉和湖北宜昌的生育政策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还权于民是人口计生综合改革的大方向”、“在政策层面不应鼓励农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产生”以及“计划生育改革要有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观点。

穆光宗还较早对一孩生育政策进行了认真反思。2000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0年9月25日）发表20周年之际，发表《“一胎化政策”的反思》（《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提出我们对严格控制人口的合理程度重视不足，低估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巨大风险。2002年，穆光宗在对甘肃、浙江、湖南等五省调研的基础上，撰文（《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存在着五种风险的观点。此后，他还就《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确立适度低生育率 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题分别发表论文。近年来，穆光宗教授在研究中密切关注生育政策研究，撰写了《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论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人口优化理论再探》、《树立全面友

好的新人口政策观》等文，对我国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经济社会后果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生育政策提出相关建议，为我国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正在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之际，穆光宗的新作《人口生态重建》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该书内容丰富，从二孩政策实施，超低生育率风险，人口老龄化和我国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和生育政策等不同视角进行前瞻性的分析研究，深入浅出，可读性强。本书可供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高校师生、政府部门的相关领导和实际工作者、以及广大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未来几十年内我国人口的低增长、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相信本书的问世，能够推动我国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关注相关问题，并不断开展更多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and 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让人民成为发展的主体和共享发展成果。人力资本的适当数量与质量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最重要基础。那种认为人是发展的“成本”和“见物不见人”的偏见，以及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国家民族长期发展需要的短视观点与政策思路都应该被彻底摒弃。

2015年11月22日于上海

## 序三 人口的重生

景军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迎来由上升到下降的拐点，这一下降趋势在 80 年代末得到加强，使我国在 90 年代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并在随后 20 多年保持着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根据 2010 年进行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估算，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不足 1.2，这在国际人口学界被归类为极低或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人口结构及其再生产面临严峻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从 2002 年开始调整以一胎化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开放“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人口控制政策的连续调整吸引着公众和学界的目光：对生育政策调整的读解和效果评价占据国内公共讨论的重要位置，而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怀默霆（Martin Whyte）等人近来有关我国生育政策的研究亦显示出国际学术界对这一议题的广泛关注和智识兴趣。作为我国资深人口问题专家，穆光宗先生通过本书为这场广泛参与、意涵丰富的讨论提供了主位立场且不乏专业洞见的声音。

本书聚焦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历时延展及共时结构分析，不仅将一胎化政策放在我国人口控制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呈现了计划生育的话语权由家庭计划向国家支配转变的谱系，还以人口和家庭结构为基本框架对计划

生育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判断。穆先生富有穿透力地提出，贯穿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不变原则乃是基于传统的人口观念，这一观念将人口视作资源消耗的载体，因而人口的急剧增长只会为环境和社会带来压力，人口数量和规模的控制是人口领域的首要问题。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国家对人口数量与环境承载力之间对立关系的预言作用和对人口规模控制以增进社会福祉的价值取向产生了人口结构失调、人口和社会安全风险的未预结局：独子的唯一性与人生命历程中存在的既定风险相结合，导致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结构性风险；生育率迅速降低加速了社会老龄化进程，年龄结构失调与独子现象一道形成“独子老龄化”、“少子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一胎化政策与男孩偏好缩小了生育选择的空间进而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调，被挤压出婚姻市场的“狼性人口”滋生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安全与秩序的隐患；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使我国人口安全储备不足，削弱了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并没有将生育率降低及其结构性风险完全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而是通过将生育行为放在家庭主观意愿、环境制约、政策力量、文化塑造的复杂张力关系中来检视。穆先生敏锐地意识到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来的生育意愿低迷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发展带来的意愿萎缩与计划生育的外部控制形成的加合力量导致了超低生育率水平的出现及持续。当这种加合力量具身为一种在数量上以只生一个甚至零生育为目标，以晚婚晚育、优生贵育为特征的“新生育文化”，以“二孩政策”为工具性形式的生育权限改革便不会导致“婴儿潮”、“生育扎堆”或生育率大幅反弹的后果，却也没有能力挽回持续低迷的生育率，这正是“超低生育率陷阱”的文化意涵。一个结构失调、再生产机制断裂的人口无异于挣扎在凋敝边缘，如何使家庭恢复生育意愿，不仅关乎家庭的再生产，也联系着人口的重生。

针对这一困境，穆先生发轫我国传统生育观念，提出了解决生育率低

迷问题的文化可能性。他认为,当今人口结构失调问题不是由“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本身而是因其与“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歧视的畸形结合所导致的,特殊的“生育扎堆”现象亦是以生肖偏好的文化观念为基础的;进而,对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进行性别公平、生育合理性的改造、为生育行为赋予能与“新生育文化”相互制约的文化意义,是促进我国居民生育意愿极具建设性的进路。由此,本书成功展示了如何为人口学分析赋予独特的中国语境,这一语境不仅是可供选择的文化分析框架,更是具有生命力的能动主体性存在。对人口议题文化面向的见证,使本书较其他人口学分析更具人文尊重,它提醒相关研究者和公众在关注人口议题时不要盲目陷入现代科学理性的单一逻辑漩涡,而要审慎辨析并积极参照文化地方性和多样性所蕴含的价值与潜力。

在此基础上,本书为我国人口公共政策设计做出了建设性贡献,提出了我国人口再生产恢复良性运行的积极策略:其一,从过分关注人口数量和规模转向关注人口结构,树立科学的人口观念,继续生育权限改革;其二,从计划生育转向优化生育,积极推动生育导向改革,引导家庭生育计划自主负责,朝适时、适龄、适量的适度生育和减少生育风险的优生优育发展,归复向“一个家庭拥有两个孩子”的“合适之家”;其三,深化生育服务和保障改革,调动国家力量、动员社会资源为优化人口提供人文关怀、优质服务和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

本书的另一个洞见是针对老年人污名及其学理合法性提出的反思性见解。随着社会老龄化特征的日益凸显,年龄歧视一直是笼罩在社会舆论氛围之上的阴影。对老年人生产能力和社会贡献的忽视以及对其社会负担的标签化定义,显然与一些人口学研究者关于人口红利的偏见性主张有关。这些学者认为,人口红利仅仅是指低人口抚养比,亦即劳动年龄人口数对非劳动年龄人口数的相对优势使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较低。穆先生极具批判力地指出,这一主张混淆了“人口红利”与“人口机会窗口”两个概念,

人口红利实质上是指人力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经济财富和社会效益，它是不同人口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诸多方面所做出的多样化贡献。因此，人口红利便不仅仅是由人口更替带来的增长效果，还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的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迁移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的人口流迁红利、老年人社会化和参与的可能性蕴含的老年人口红利。在这一框架下，老年人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可以通过将其赋闲时间有效化，以再就业、社区志愿服务或“低龄老年人帮助高龄、空巢甚至是失能的老年人”的养老互助方式实现老年人对社会的积极贡献；对老年人本身来说，这也是积极老龄化的合理路径。就此而论，本书不仅可以被视为致力于消除年龄不平等的人类学努力，也可以被称作帮助老年人实现生活质量自我提升的社会工作实践。

通过本书，穆先生将其长期以来的思考和研究积累以系统化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他向关心中国人口状况的相关研究者和文化公众发出邀请，共同面对和审视二孩政策开放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公共议题，他以极具可读性的笔触为回溯性理解计划生育政策发展脉络、深入检视现今人口结构及其问题、展望未来人口发展形势及应对之策提供了范例并展现出丰富的讨论空间。

谨以此序对穆先生新著出版表示祝贺，愿穆先生能为我国人口学研究以及生育计划的公共讨论和政策实践做出更多令人尊敬的贡献。

乙未年冬于清华园

# 目 录

序一 生育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自由生育

序二 以人为本的生育政策的求索

序三 人口的重生

## 第一章 二孩时代：面向未来的选择

|                        |    |
|------------------------|----|
| 计划生育的三次转变·····         | 2  |
| 持续一胎化动摇大国根基·····       | 5  |
| 老政策遇到新问题·····          | 8  |
| 与“中国梦”渐行渐远的政策伦理·····   | 11 |
| 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      | 15 |
| 卫护底线生育权·····           | 18 |
| 计划生育要符合“人民要求”·····     | 22 |
| 人口发展：春天在哪里？·····       | 29 |
|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改革的“信号弹”····· | 33 |
|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改革的“集结号”····· | 36 |
| 二孩生育：全社会的大使命·····      | 39 |

|                   |    |
|-------------------|----|
| 让“婴儿潮”来得猛烈一些····· | 43 |
| 不幸应验的“低生育陷阱”····· | 46 |

## 第二章 风险社会的到来

|                        |     |
|------------------------|-----|
| 独生子女的九大风险·····         | 52  |
| 人口安全“危乎其危”·····        | 57  |
| 人口塌陷：“四二一”的结构性危机·····  | 64  |
| 全面放开二孩解决不了少子化危机·····   | 67  |
| 失独：二次伤害何其深·····        | 70  |
| 失独的责任：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 73  |
| 按下葫芦起了瓢，四大风险步步高·····   | 76  |
| “狼”来了：今天剩男，明日隐患·····   | 80  |
| 十年呼吁梦成真·····           | 85  |
| 实现适度生育·····            | 91  |
| 二十年前的“杂音”：少生不是一切·····  | 94  |
| 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价值贡献·····      | 99  |
| 废止“限制生育”此其时也·····      | 102 |

### 第三章 银发浪潮 惊涛拍岸

|                  |     |
|------------------|-----|
| 没有计划到的老龄化危机      | 106 |
| 人口老龄化的一喜三忧       | 109 |
| 红绿灰白黑,老人分五类      | 113 |
| 望老却步,社会之哀        | 116 |
| 养老模式之“1 + X”     | 119 |
| 从“老有所养”到“养所有老”   | 122 |
| 关爱“空巢老人”         | 126 |
| “空巢孤独死”或成社会常态    | 129 |
| “如东现象”:大国空巢危机的缩影 | 133 |
| 解决老龄问题的十个关键词     | 136 |
| 从“未备先老”到“有备而老”   | 139 |
| 应对“不健康老龄化”的挑战    | 142 |
| 老年人口红利伴奏和谐社会     | 146 |
| 积极老龄化压倒一切        | 149 |
| 文化养老风光无限         | 152 |

## 第四章 重建人口“生”态

|                        |     |
|------------------------|-----|
| 生育文化：可待春风花又红·····      | 156 |
| 生育扎堆是个伪命题·····         | 162 |
| 人口新政终极使命：造福于民·····     | 167 |
| 从风暴中来，到和谐中去·····       | 170 |
| 翼城实验：孤案之痛·····         | 177 |
| 期待社会抚养费制度寿终正寝·····     | 181 |
| 让“计划生育”回归“自主生育”·····   | 185 |
| 从计划生育到优化生育·····        | 187 |
| 家庭视角下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的对策····· | 192 |
| “健家计划”的价值发现·····       | 195 |
| 破解“越穷越生、越生越穷”魔咒·····   | 199 |
| 人口悲观论将人类引向歧路·····      | 202 |
| “人口承载力”理论辨析·····       | 207 |
| 别让“全面二孩”只是看上去很美·····   | 211 |

## 后 记